

「在邊境的社區：華南僑鄉的
歷史、文化和社會結構」專號

前言：活在邊境裡——

中國東南沿海的僑鄉社會

2008年11月中新社的一個報導指出，中國沿海地方社會需要拓展僑鄉的優勢、適當利用僑鄉的文化資源。在福建、廣東等老僑鄉的社會，應該「由注重老一代僑民向一、二、三代僑民並重轉變，在鞏固與老一代僑民聯繫的基礎上，通過認祖宗、拜祖祠、祭祖墓活動，增強二、三代僑民對家鄉的認同感」。^①地方社會以宗族、廟宇、慈善和節日等促動海外不同世代的華人對故鄉的戀懷，對祖宗原鄉的憧憬，吸引海外華人重新建立割斷了的家鄉聯繫，是當代僑鄉社會將傳統轉化為有效的文化資源的重要策略。

早在1920年代，陳達在他的開拓性著作《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已經注意到海外華人對原鄉文化和社會的影響；移民不僅改變了地方社會的家庭結構，新的語言和習慣滲透原鄉的生活方式，同時龐大的僑匯也帶來地方社會的近代化。^②然而，在政治和金融動盪的20世紀上半葉，對海外華人的關注，很大程度還是集中在政治和經濟的範疇。隨着1949年新政權的建立，在破四舊的政治語言下，很多的研究集中在宗族或與宗族相關組織的解體，以及1970年代末期改革開放以來宗族功能隨着海外鄉親的投資的再現。^③改革開放以來，海外華人大量的投資也吸引了國內學者對海外華人的原鄉社會的注目。這些研究以宏觀的角度強調海外資本和投資帶來的經濟的衝擊、注重當前的經濟狀況。^④正如莊國土在1998年在晉江舉行的中國僑鄉研究國際研討會中強調，「宏觀把握的科學性需要微觀研究的支撐。為了透視近二十年海外華人與中國的經濟、文化合作，我們選擇僑鄉作為主要研究對象。這不僅因為僑鄉是海外華人與中國進行經濟合作的最主要區域，而且因為僑鄉的

① 〈福建著名僑鄉福清市傾力打造僑務資源可持續發展〉（中新社，2008年11月20日）。

② 陳達，《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

③ Woon Yuen-fong, *Social Organization in South China, 1911-1949: The Case of the Kuan Lineage in Kai-Ping County*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4); Woon Yuen-fong, "International Links and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ral China: An Emigrant Community in Guangdong," *Modern China*, 16: 2 (1990): 139-172.

④ 如林金枝，《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概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

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可能對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有一定的先導作用」。^⑤ 隨着改革開放的步伐，「近二十餘年來……僑鄉一詞的使用率空前頻繁」。^⑥ 陳志明和丁毓玲指出，僑鄉和僑鄉研究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在改革開放後，中國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如福建和廣東，如何鼓勵和促使海外、港、澳、臺的華人回鄉和投資，另一方面是僑鄉人們如何巧用海外關係，使海外關係這一特殊資源為僑鄉的民間風俗、宗教復興等各種民間活動保駕護航。」^⑦ 經濟和文化的動力，究竟帶來了近代化和西化，還是加強了原鄉的傳統文化？20世紀後半葉，海外華人研究從強調華人落葉歸根、回返故園的意願到在異地落地生根、再建家園的過程中，探索了海外華人身份認同的轉折。在新世代的華人與祖先的原鄉再連接的過程裡，海外華人與原鄉的文化再認同，是否一種虛擬的歸根現象？

華琛(James L. Watson)在2004年亞洲學會的主席演講中，以香港新界北區邊境的新田鄉文氏為例，指出在1950年代以後，新田急速成為典型的僑鄉社會，即：男性離鄉，老弱婦孺留鄉，社區由農村演變為依賴僑匯的經濟體系。雖然如此，前近代的親屬關係如華人的宗族制度仍然在後現代社會中活躍。華琛進一步指出文氏是一個有七百年歷史的宗族，清楚的故鄉，共同的姓氏和語言，可以追認同一祖先。和其他以族群為定義的離散社會不同，文氏以祖先為名，擁有土地、不動產等祖嘗。初代的移民與家鄉懷抱根固的感情，期盼衣錦還鄉的日子，捐資修建家鄉的祠堂、廟宇、學校以至節日慶典。第二、三代的華僑在僑居地定居。故鄉成為他們度假之地。他們雖然離散各地，然而，根固的宗族關係，成了非正式的網絡建構的關鍵。親屬團體成為一些當代最成熟的跨國流離社會的組織平臺。^⑧ 對新世代的海外華人來說，重新擁抱家鄉，追根溯源、追尋文化根源等尋根的文化活動，是對一個消失或從沒用經驗過的過去的想像。然而，這樣的懷舊、這樣的認同、這樣的想像，究竟是嶄新的產物，還是這個不斷受來來去去的人群帶動的邊緣地

⑤ 莊國土主編，《中國僑鄉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0），頁1。

⑥ 陳志明、丁毓玲、王連茂主編，《跨國網絡與華南僑鄉：文化、認同和社會變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06），頁2。

⑦ 陳志明、丁毓玲、王連茂主編，《跨國網絡與華南僑鄉：文化、認同和社會變遷》，頁2。

⑧ James L. Watson, "Presidential Address: Virtual Kinship, Real Estate, and Diaspora Formation—The Man Lineage Revisite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3: 4 (2004): 893-910.

域的固有生態？

早期的海外華人大部份來自福建和廣東的東南沿海地區。從陳翰笙、傅衣凌、弗里德曼以至科大衛、劉志偉的研究，我們知道最晚從明代中葉以來，東南沿海地方是男性主導的宗族社會。宗族不僅是控產機構，而且是左右鄉民日常生活的文化語言。陳翰笙等在1920及1930年代的調查顯示，南中國廣大的田土，大部份是公共財產，尤其是以宗族為名的嘗產。^⑨ 弗里德曼以為這與地方社會的邊陲性有關。而科大衛則以為鄉民透過想像和實踐以祖先崇拜為中心的宗族制度，把地域社會嵌入皇朝國家的體系之中。身近的邊陲地域的流動物質資源、遠離的皇朝國家的文化資源，提供了僑鄉社會可以操控的多元的能動力。

本輯收錄的文章是2008年度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贊助的「在邊境的社區：華南僑鄉的歷史、文化和地域網絡比較研究」（計劃編號：RG001-P-06）項目的研究成果之一。在這個計劃中，我們試圖比較有長期的移民經驗、與海外華人社區有悠久歷史的東南沿海的僑鄉社會的內在構造和海外聯繫。本專號主要集中討論邊境鄉村的內部結構的問題。1990年代以前的僑鄉（或移民社會）研究，大多是過度概括、並且以單一的角度理解僑鄉的歷史發展。我們在這裡嘗試展現的是邊陲的僑鄉社會多重的深層結構，鄉民如何競逐權力、控制資源、塑造身份、益善人群。透過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結構和文化方面的深層理解，將有助我們明白僑鄉社區中便利移民和商業管理的網絡關係的創造和再創造的歷史過程，人脈和制度之間的互動關係，海外華人追根認祖的根據，以及僑鄉社會用作吸引華僑華人的作為文化資源的傳統。

蔡志祥（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⑨ 陳翰笙主編，《廣東農村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館，1934）；Chen Hansheng, *Landlord and Peasant in China: A Study of the Agrarian Crisis in South Chin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6)，中譯本：陳翰笙著，馮峰譯，《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華南農村危機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馮和法根據廣東省農民協會在1925年的調查，以及全省農民協會執行委員會第一擴大會議代表報告，指出廣東全省的公田佔全省田地的三分之一。馮和法編，《中國農村經濟資料》，下冊（臺北：華世出版社，1978〔1933年初版〕），頁929-930。